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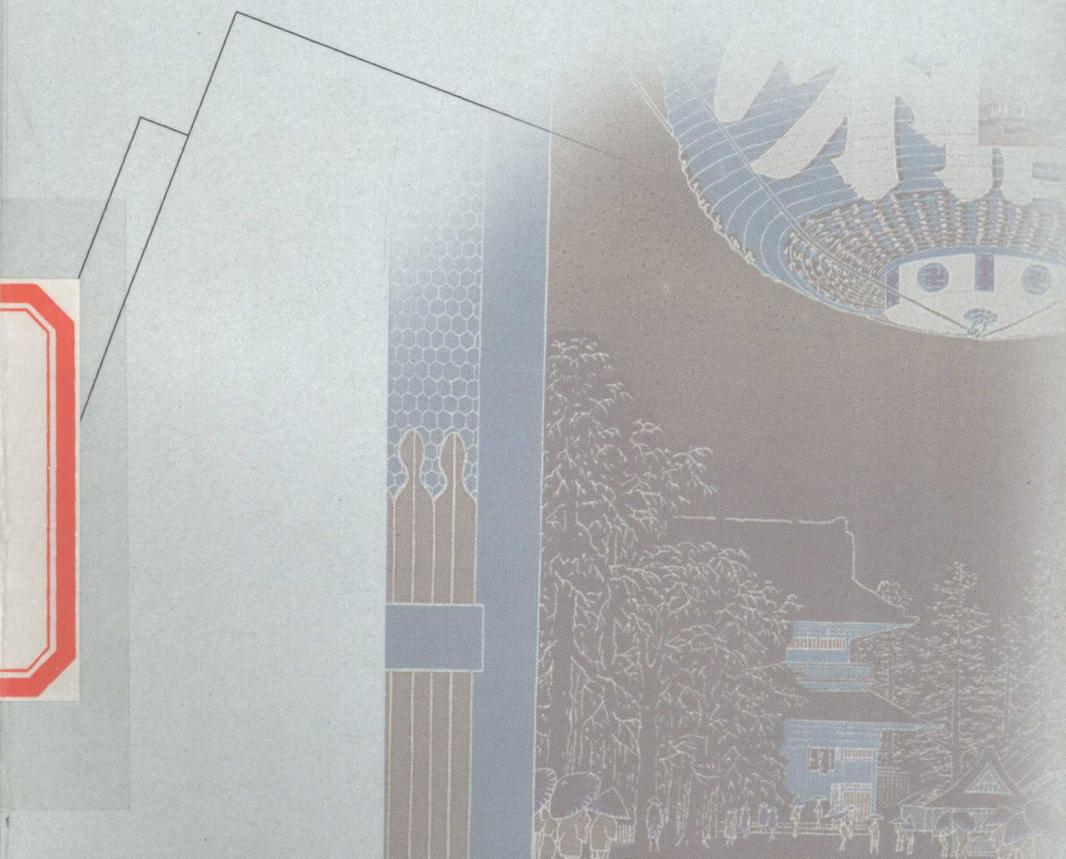
(日) 大口勇次郎 著

DECHUANSHIDAIDESHEHUI

德川时代的社会史

呼斯勒 林思敏 李颂玉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116

德川时代的社会史

中野实 著 陈思 译 李俊彦 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德川时代的社会史

大口勇次郎 著
呼斯勒 林思敏 李颂玉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时代的社会史/(日)大口勇次郎著;呼斯勒等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04-06871-8

I. 德… II. ①大…②呼…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日本-江户时代 IV. 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863 号

德川时代的社会史

[日]大口勇次郎 著

呼斯勒 林思敏 李颂玉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04-06871-8/G·1603 定价:18.00 元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 德川幕府的政治与社会——如何看待江户时代	4
1 以古代中国为借境的“封建制”	4
2 世界史中的封建制	8
3 石高制与“役”的体系	11
4 另一个江户时代	14
一 轭园祭与町的财政——京都六角町观音山	19
前言	19
1 轩役与地口	20
2 祭祀音乐的经费	26
3 御山屋顶的建造资金	31
4 经费负担的构造	38
二 信州农村的江户奉公人——以高井郡矢柞村为素材	43
前言	43
1 江户奉公的实际情况	47
2 奉公人的家计	56
结语	71
三 幕府末期平民之间互赠礼物与交际情形	74
1 拜年、中元、岁末赠礼	75
2 法事与探望天花患者之礼节	78

3 从答礼来看交际的情形	82
4 和住在江户之人的交际情况	87
四 乡村的犯罪、搜查与审讯	93
前言	93
1 盗窃与搜山	95
2 “关东取缔出役”和日野宿临时监狱	100
3 搜查与审讯	104
结语	112
五 农村改革与“关东取缔出役”的活动	117
1 “关东取缔出役”的登场	117
2 管理物价、储藏粮食、限制酿酒	120
3 监察河流与枪支调查	126
4 天保7年之“旧弊改革”	131
六 最初的拜领地——以田沼和大冈之情形为例	137
七 “旗本”“御家人”的世界——《梦醉独言》的实像	144
前言	144
1 赌徒“旗本”的履历书	146
2 冈野家的家庭收支和地租收入	151
3 管家骚动与筹款旅行	158
4 后事之经纬	165
八 吹尘的梦——幕府史料的再生	168
结语	175
译者后记	184

中文版序

本书的主题,在于揭示从 18 世纪起至 19 世纪上半叶时的日本社会。

所谓德川时代,是指历经数个世纪的战乱时代,用武力统一国内的德川家康于 1603 年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构筑了统治全国土地和人民的体制起,至 1867 年德川家屈服于强有力的大名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统治权,进而于翌年在武力斗争中败北,退出历史舞台为止的这 260 年间的时代。因为德川幕府以江户为政治中心,因此亦称江户时代,而若以用于划分时代的名词来概括,则又称其为“近世”时代。

在这一时代,在京都虽然存在着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宗教性的权威而已。德川幕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大名(诸侯),武士阶级垄断了行政和军事,因而使安稳的行政统制得以实施。就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当初本来以平稳地征收米谷年贡和供给为目的,试图展开以大米和谷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然而,自从进入 18 世纪后,各地的商业性农业和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却相继得到了发展。不过,作为社会全体意义上的现代新型政治、经济框架尚未形成。除去最后一章,本书正是对这样一个德川时代的乡村、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行了探索。

从外交上讲,幕府政权仅仅与朝鲜以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保持着正式关系,相互之间进行着贸易往来。当时统治中国大陆的明帝国和清帝国虽与相当于现今冲绳县一带的琉球国缔结了册封关系,但与德川幕府却没有结成正式的外交关系。仅有为数不多

的生活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民间人士远航来到九州、长崎港,不定期地在这里进行着受到了限制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和过去相比,这一时期,一衣带水的日本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往来,也缺乏信息交流。日本人对同时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

自6至8世纪,日本在形成统一国家之际,在文字、法律、政治组织、城市规划乃至佛教、美术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可是,到了断绝了人际交流的德川时代,公元前5世纪在中国所写的《论语》也为初等教育的教材所使用,《大学》作为当时诸侯等为政者政治理念之理想,亦成为其所思考的对象,对此,又有多少现代中国人了解呢。广而言之,德川时代也是为儒家文化圈所包摄。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德川时代的学者们努力倡导以中国古代王朝为典范的政治思想。这与19世纪下半叶以降,在西洋文化东渐之际,日本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序章中有所论述,希望能以此章参考为盼。

今天,为研究日本历史而来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的留学生们主要所关心的是“日本的现代化”问题。可是,现代化并非单纯地由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扩大工业生产所能带来的。我们应该对带来现代化的社会历史基盘予以充分地关注。如果能从这一角度阅读本书的话,那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譬如,本书第8章便是对诚实地生活在德川时代的人物面对现代化时所采取的态度的一个展示。

本书是面向日本的历史研究者而写的读物,对幕府时代缺乏了解的读者阅读本书时或许会感到有些吃力。但是,我想,从认识儒家文化圈对前现代社会的共同性这一角度而言,大体上是应该能够领会本书的意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拙著若能够引发中文版读者就两国前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共通性和差异性进行探讨的

话,那么,笔者将甚感荣幸。

本书是由吉川弘文馆(东京)出版的日文版《德川时代的社会史》(2001年5月)翻译而成。正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留学的呼斯勒(博士课程)氏,以及林思敏(博士课程)氏、李颂玉(硕士课程)氏3人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3人虽然专业各不相同,但为了能正确、贴切地翻译出原作,相互间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笔者铭刻在心。对为翻译和出版而努力斡旋、立下苦功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吉田ゆり子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此,对在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出版中文版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对为本书的翻译予以支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别是对于同意对原作予以翻译出版的、原作的出版社——吉川弘文馆表示谢意。

大口勇次郎

2003年1月19日

序 德川幕府的政治与社会

——如何看待江户时代

1 以古代中国为借镜的“封建制”

江户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呢？这说来容易，其实是个挺困难的课题。从最近有关江户时代的研究动向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先从那个时代的人所言之事来谈。

幕府的儒官室鸠巢立志经世之学，官侍家宣、家继、吉宗等三代将军，终其一生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他学习古代中国王朝的制度，将国家政治体制分为“封建”与“郡县”⁽¹⁾制。

在周朝盛期实行的“封建”分国制，乍看之下造成了诸侯作乱，殃及皇室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诸侯也成为一种屏障，实际上有着维护皇帝安全，国泰民安的作用。所以周朝保有九百年的长久政权。而实行“郡县”制的秦汉两朝虽然全国领土收归皇帝所有，但全国并未得到安宁，反而各地的暴动作乱频繁不断，导致皇统四百年即告结束，远不及周朝长久。

室鸠巢把从上面历史中所得出的“封建”与“郡县”政体论，拿来套用日本的历史。由于古代的律令时代制度为“国司（由中央所派遣，负责管理各国的地方官）代代领有其地”，与周的“封建制”相似，所以“王朝中诸国安定”。但在武士兴起后的镰仓、室町时代，

政治体制转变成“诸国地头(中世纪庄园的庄头)兴起,代官治理”的“郡县”制,所以变成“牵一发而骚动起,镰仓、足利幕府虽只二百年,但未有太平之一日”的情形。

如上所示,室鸠巢所言“封建”“郡县”之论中,“封建”不见得是指诸侯的领土、分权之制,“郡县”也不见得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如他所言,虽然是“封建”,但诸侯具有保护王室的作用。换言之,以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而言,诸侯的角色取决于两个选择——在于认同其领地俸禄之意义的“封建”制,或是否认其意义的“郡县”制。

以江户时代而言,打下江山的家康认为“诸国中设诸侯;大国也应托将军各家治理”。亦即模仿周制。换言之,被视为理想的政治体制之“封建”制不过是德川幕府维持政权的一种“长久之计”罢了。

乍看之下,这种主张是在赞美儒教兴盛的周代,拥护自己所侍奉的德川政权,但这只是一般的看法,事实上并非如此。室鸠巢接受将军吉宗的咨询,就幕府的制度、政策,数度向上提出改革的意见,试图改正幕府的弊害。例如,在对于武士俸禄的提案中提出,(1)关于大名的参勤交代*方面,除了检讨周代以来的制度外,主张“半年在江户,一年半在城”,(2)将“旗本”“御家人”**的官邸从城下移至“江户城外三五里之处”,(3)新增的家禄中可以世袭的部分也一改前例,只限于一代。

* 江户时代时,德川幕府规定大名每隔一段期间必须轮调于自己领地与江户之间。——译者注。

** “旗本”为直属江户幕府将军的武士,俸禄为1万石以下,可直接拜见将军。“御家人”为江户时代直属将军的下级武士,不可直接拜见将军。——译者注。

这些提案的目的不见得是在于加强对“大名”* 旗本的统制,以达到“封建”分立的结果,相反,是为了解决幕府财政问题的一种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都是列举周代或其它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制度、政策,以此为绝对的规范,来批评时政。因此,这些提案都是以朱子学为自负、充满了自信的强烈主张,但其内容却有点不合时宜。

另外一方面,和室鸠巢那样,时常上书给将军吉宗的获生徂徕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获生徂徕原来侍奉柳泽吉保,之后在江户开私塾,倡导古文辞学。他以孔子所想继承的周代之前的“先王之道”为理想。意即今日先王之道不兴,所以应建立治国安民的制度与法律。因此他向幕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²⁾。但是他不像室鸠巢那样主张周代的教条式的封建制度。而是觉得若要在当今实现圣人之道,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所以要分析现状,对症下药。

获生徂徕所描绘的江户时代的社会情况是一个强力的官僚制政治组织。而在这个巨大的都市江户中,各种政治、社会乱象丛生,因此必须加以改革。他所提出的有关武士俸禄的改革方案中,以(1)不让武士住在江户或城下町**,令其居住在领地,(2)废止大名的国替制度(江户时代时,德川幕府因奖惩等理由,任意支配改变大名的领地)最值得注目。关于第一点,大名旗本集中居住在江户后,造成种种弊害。例如,武士集居江户后,造成货币经济加速,物价高涨;而其官邸集中于江户后,火灾频繁;町人的歪风恶俗蔓

* “大名”:由幕府将军直接授予领地的武士,俸禄为1万石以上,依其规模又有拥有国、拥有城、无城等之别,另外,依其与将军之亲疏,又有“亲藩”、“谱代”、“外样大名”等之区分。——译者注。

** 城下町:中世至近世时,最具代表性的都市类型。其以领主的城市为中心,由家臣的宅邸、寺院、工商业者的商店等所组成。带来经济、工商业技术和文化的发达。——译者注。

延及武士；而因武士从农村外移，造成农民不知安分守己。而有关第二方面，原本国替制度的作用在于削减大名的实力，但最近已不合时宜；而且除了对“谱代大名”不公平外，赐予要地给年幼的大名也非好事。这些主张都是强调武士的在地性，扶植诸侯，将其视为一种屏障，这一点和室鸠巢的看法相同，两者都是所谓的“封建”论者。但是获生徂徠较能清楚地把握现况，指出改革的方向。此点和室鸠巢大不相同。

对于赤穗藩浪人入侵御使吉良义央的官邸、为主报仇的事件，这两位有名儒者的反应极为不同。室鸠巢在事件发生后，撰写《赤穗义人录》，称赞这些浪人为义士。根据朱子学的解释，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义举，背后有该藩独特的武士伦理存在。而现实主义的获生徂徠认为浪人的义举虽然应受肯定，但幕府的法律位阶较高，所以最后浪人们切腹自杀，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两者间的差异，同时也在经世济民主张中看得出来。

前面对室鸠巢和获生徂徠两人的经世论作了稍微深入的比较。但对于江户时代，试将两位儒者的共同主张加以归纳的话，他们都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封建”制视为一种理想的制度。模仿这种封建的德川政权，虽和中国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应该也算是一种“封建”制的形态吧。所以，与其说封建诸侯（大名）是呈分立的状态，倒不如说是被赋予了一种保护将军家的使命。这一点反映了当时幕府与诸藩的权力关系。所以这两人都是基于经世济民的信念，向幕府提出改革的计划，充分显示了德川“封建”制度的集权特征。

2 世界史中的封建制

依据儒学家的看法,江户的社会是一个和中国古代呈对比的“封建”之世。但随着锁国的结束,和欧洲世界开始交流,这个社会也被拿来与其它社会模式、规范作比较。

1895年(安政6),英国公使奥考克(Alcock, Sir Rutherford 1809~1897年)以其在日本的经历,撰写了游记《大君之都》。其中有这么一段⁽³⁾。

“和日本人共同生活后,如同回到数个世纪之前。从日本史中又再次地体验了过去我们曾拥有的封建制度之特征……换言之,虽然时空不同,这里也有封建制度。这个封建制度所有的主要特征和我们大致相同、类似,不禁令人吃惊。但是相异之处也不少。所以研究这东洋版的封建制度,的确是相当有趣。”

换言之,19世纪60年代的江户时代和数个世纪之前英国的“封建制度”相较之下,“这个封建制度所有的主要特征和我们大致相同、类似”。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比较史上的问题,这两个时空不同的文明社会之制度,竟然如此相似。其二,在相似性的表现上,英语的“feudalism”被拿来和儒家的“封建”一词画上等号。不可否认,虽然“feudalism”一词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有着诸侯分立制度的意味,发明这一个译语的人也令人佩服,但因为这个译语的关系,造成了中国古代王朝、欧洲中世社会和日本江户

时代三者相同的刻板印象,此点甚为奇妙。

对于封建制度(feudalism)的研究,众所皆知,在欧洲的研究学者中,有专门研究领主制和农奴制的经济史学家,也有研究俸禄制和家臣制的国制史学家。而在日本社会的比较研究上也有这两种研究方法。

前者的学者中,马克思(Max, Karl 1818~1883年)比奥考克更早注意到“东洋版的封建制度”,他在1867年的《资本论》中就提到,“日本的土地所有是一种纯粹的封建制,因为小农的经营发达,……与我们历史中所有的封建制度相比之下,对于研究欧洲中世的封建制,提供了一个更忠实的参考。”这一点让前述的第一个问题不单只是停留在游记的感想上,而是进一步地进入学术的领域中。此后,在探讨江户时代封建社会的概念时,这更成为了一个主流。

另一方面,正如奥考克所言,欧洲中世和江户时代间有“诸多相异之处”,而韦伯(Weber, Max 1864~1920年)认为,欧洲的封建制不像江户时代的国替制度那样,中央对于诸侯的统治并不是强权性的。所以从比较日欧的主从制度上来看,可否适用于封建制度,这尚有待商榷。

在战前的研究中,江户时代虽被认为是封建社会,但研究的重心在于德川幕府的权力集中上。如“警察式的封建制”(福田德三)或“集权式的封建制”(本庄荣治郎)都是在探讨此一独特性格,证明前述的观点。

战后的历史学在日本史的研究上则是根据“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重新作一个出发。为了摆脱战时的皇国史观,排除了日本的特殊性,以贯彻历史的发展法则为中心来从事研究,而对于江户时代的研究亦不例外。特别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以马克思的“封建制式的土地所有和小农经营”等来作为研究手法。例如江户时代隶农制确立上的“纯粹封建社会”之见解(藤田五郎),丰臣时代小

家族经营的农奴制的发展与封建革命期的主张(安良城盛昭)等的出现,造成了在20世纪50年代中,“太阁*检地(丰臣秀吉以石高——大米的预定生产量为单位,丈量全国土地,促进农民自立,并莫立兵农分离的封建社会基础)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盛极一时。从摆脱战前的封建旧制,着眼于战后日本民主化等共通课题的当时社会而言,江户时代被当作世界封建史上的研究对象,成为封建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

之后,研究的方向转向对于支持小农经营条件的探讨,例如农作物的生产流通、市场结构、城下町和农村的分工情形,并扩及整个藩和全国性的再生产的结构。从这时开始,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社会的研究才得到重视。在学术界,1960年举行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佐佐木润之介的报告是一个划时代的研究⁽⁴⁾。这个报告透过江户时代社会的再生产构造和幕府的军役,来探讨幕藩权力的成立。这个研究的想法被认为是与作者意识到当时的现代国家强力体制相关。

顾名思义,“幕藩体制”一词可由两个观点来探讨。其一是限于政治支配体制,和经济等关系分开来看;其二是从社会关系的基础,即和生产结构的关系来综合地探讨政治机构。简言之,以前的研究着重在生产的关系上,而现在的研究重心在于统治权力结构上。另外,“幕藩体制”这个名词所指的是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和诸藩所组成的特殊支配体系。这和一般的封建制度有许多不同,俨然是有追求日本式特质的味道。其后,有位近世史学家不把这种对于江户时代研究方向上的改变称为“后期”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发达“前史”,而另外开始主张这个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给予新的评价,称之为“近世史的自立”。其立意便在于此。⁽⁵⁾

* 太阁:丰臣秀吉的尊称。——译者注。

3 石高制*与“役”的体系

“近世史的自立”之论点,自出现起迄今为止已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探讨这一时期幕藩体制详细的研究动向并非本论文的目的。而且也应由学界杂志来予以评价才是。所以在此只有点到为止。

关于幕藩体制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主要是以江户时代的生产流通构造为主,研究所谓的“再生产结构论”。70年代后以此为基础的幕藩制“国家”论成为中心。换言之,在幕府与诸藩所构成的幕藩体制中,藩已丧失了维持独立的基础,政治权力向德川幕府集中,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国家。从这个观点来看,这十几年中所举行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身份、村落、都市、外交、农民斗争等研究主题都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因此,使得现代的研究在累积后,比所谓的幕藩体制论来得细致。

主导这个研究动向的佐佐木润之介在最近把70年代后幕藩体制的特征明确地作了以下的归纳,详细地指出问题所在,具有参考价值⁽⁶⁾。换言之,依佐佐木氏所言,“幕藩体制国家,具有日本式封建制国家的特征,在各方面兼具‘专制、中央集权的特色’。70年代的国家史研究中,主要都是把这些‘要素’加以列出,与其在历史上的角色为中心,进行探讨”。佐佐木氏把这些要素列出十四项。在此,笔者加以整理,重点如下。

* 石高制:丰臣秀吉于1591年命令丈量全国土地,以土地的肥沃程度和面积计算大米的生产量,用来作为征税的标准。而后,武士的俸禄,农民的土地皆以“石高”的单位来表示,使得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得以严格区分(即“兵农分离”),形成特有的中央集权制度。——译者注。